

## 夢縈雲之南

雲南，從三歲多開始，便覺得是個遙遠、神秘地方，不是因為爸爸把我抱在膝蓋上講七擒孟獲，卻是因為姊姊。她在西南聯大上學，二年級暑假回重慶探親。那時我們住在歌樂山上孤零零茅廬中，她的出現猶如旋風，帶來了無窮歡樂和新鮮事物，其中最震撼的，便是幾張石林照片。在一兩寸見方的黑白畫面上，那無數猶如刀削斧劈的大小石柱石屏風森然矗立，四方八面延伸到地平遠處。我看得目瞪口呆，生出從所未有的奇異怪誕之感，這雖然隨着歲月逐漸淡化，卻始終未曾完全忘懷，直至將近半個世紀之後。那時我們已經定居香港多年，姊姊剛做完癌症化療，我建議陪她重遊當年求學之地，她高興答應了。於是我們去昆明，找到了她當年的宿舍，上課經過的斜街、買小吃的亭子、她念念不忘的西山龍門，和山下曾經借住的寺院，又找到了熊景明特地介紹、在翠湖西北邊上的小飯店，依照她的指示，嘗到鮮美的雞縱、猴頭菌和牛肝菌。當然，也懷着興奮和期待去石林。不料卻大失所望，因為攤販喧嚷混雜，莫名其妙的「綠化」更完全破壞了它的嶙峋風貌，和那令人震撼的荒涼空寂。

景明在1970年代末從昆明移民到香港來，雖然人生路不熟，卻憑着信心和頭腦，在「大學服務中心」找到職位。那是美國學者為研究中國大陸而開辦的機構，1988年香港中文大學接收了這個中心。其時她已經轉到大學的政治學系工作，又在人類學系取得碩士學位，所以順理成章，成為了這個中心的實際負責人，自此以極大熱情投入工作，把它發展得生氣勃勃，名聲鵲起。我曾經在秘書處工作，故此參與中大接收中心的決策，因而認識景明。十年後，由於劉青峰和金觀濤的提議，我們同到泰國布吉島度假，一起消磨了幾天輕鬆愉快的時光，從而相熟。景明是個非常活躍、自信、活力充沛的人，對工作、幫忙朋友、保護中大校園、推動中國扶貧，還有宣揚雲南的山水、人情、飲食乃至宜人氣候，以及邀請大家到她美麗的故鄉去體驗生活等等，無不充滿熱情。我經常取笑她大概是少數民族後裔，故此才會如此天真樂觀，為一花一鳥一草一木、浮雲晚霞、海上明月而興奮莫名，忘形驚呼，但自己也往往受到她的感染和號召。

在上世紀末的金秋，我組織了一大幫朋友去遊覽昆明、大理和麗江，望蒼山，遊洱海，上雲杉坪，遠眺玉龍雪山，欣賞宣科先生的納西古樂，還見到我自己落籍昆明多年的遠房侄兒，和景明的老朋友、一輩子獻身於生物繪畫的曾孝濂先生。九年後雲南省科技廳為慶祝西南聯大成立七十週年舉辦「科學大講堂」，景明攬掇我幫忙策劃推動，然後請君入甕，我自己也受邀去講科學史問題，由是得以順便遊覽撫仙湖、彌勒的雲南紅酒莊、西雙版納，和那裏寧靜幽深的國家熱帶植物園。但最快意的，則是翌年8月景明為我和一些朋友安排的怒江之行。在她和當地一位採藥師帶領下，我們一行六人從大理驅車六庫，然後沿怒江北上，經虎跳峽、福貢、石月亮，夜宿貢山，翌日更深入丙中洛，通過高數百米的夾江石門，直奔隱藏在高山深谷老林之中、幾乎與世隔絕的秋那桶，這才盡興而返。

此行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十分寫意。現代交通帶來無限方便，卻也完全改變了時空感覺，古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悲壯意境因而無從體會，只能夠從想像中追尋了。

相熟以後，經常聽景明提起家族和一些朋友的往事，也陸續看到她寫下的回憶文章，這才恍然，她的雲南不僅僅是天氣、地理和風景，還有說不盡的人情世故、人物記憶、歷史滄桑——加上她自己的觀察、判斷、不時透閃的幽默，和猝不及防的調侃。也就終於發現，她其實有個顯赫興旺、走在時代前端的昆明大家族，享受過如詩如畫的幸福童年。然後，像無數她那一代的中國人一樣，耳聞目擊諸多親朋戚友突如其來的厄運流離，自己則在困頓艱苦、像是毫無希望的環境中掙扎成長，最後猶如從噩夢中驚醒，迎接意想不到的清晨和陽光。

這書不算長，但讀起來要費點力氣，因為它是由好幾十位不同輩份、身份、性格、際遇的人物，和無數大小故事交織而成，人與人、人與事、事與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非前後左右一再翻查對比，難以弄清來龍去脈。由此我們自然會感到它有《紅樓夢》和景明那麼熟悉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學鉅著的影子。然而不然：它是具體家族生命的如實記錄，雖然以作者本人為中心，背後卻沒有任何預設、哲學、立場，例如王國維所謂寶玉的解脫之道，或者卡列尼娜所面對的愛情與社會體制之間的不可調和矛盾，倘若有之，大概也就是對那犧牲於時代巨輪下的無數有識有為之士——例如她那位瀟灑的外公、鬱鬱不得志的祖父，以及陰差陽錯落得終生坎坷的乾爹黃滄等等——的深深喟嘆吧。所以我們對此書的整體印象，毋寧更近於收攬眾生百相的《清明上河圖》和老布魯蓋爾維妙維肖的鄉村景象繪畫，甚至巴爾扎克為了忠實記錄、解剖整個19世紀法國社會而寫下的《人間喜劇》——兩者規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背後理念卻顯然相通。為甚麼景明的這部家族史竟然有

法國文學寫實主義的影子呢？那恐怕並非偶然：她經歷過正規社會科學訓練，又長期負責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蒐集、分類、整合和顧問工作，不自覺地養成客觀精神和分析習慣，這書的基本格調大概就是由此形成的吧。

但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所以毫不奇怪，像所有自傳一樣，書中也同樣充滿了童年的喜樂、成長的艱辛、初戀的痛苦，和眾多家族成員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與許多相類似作品大異其趣，與景明平素作風也截然不同，它的筆觸語調總是那麼安靜平和，永遠帶着反省和矜持，無論興高采烈、傷心掉淚，或者痛恨入骨，都只是用淡淡一句自嘲、低低一聲嘆息、最多小小一根倒刺來表達。它不如古人溫柔敦厚，不像魯迅嚴苛冷峻，更沒有巴金的洶湧澎湃，一瀉千里。如此節制而又不失自家杼機的风格在國人文章中實不多見，卻和西方某些作家刻意散淡低調的作風若合符節。所以景明表面上像少數民族般天真爛漫，其實像許多她那一代人一樣，性格也是糅合了中國、西方、傳統、現代、大陸、香港等許多不同元素，千錘百煉而成。這些後天因素決定了她的筆觸，卻掩蓋不了她快樂衝動的天性，那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機會就會自然流露出來。

但對許多讀者來說，這書最重要，也最能夠打動他們的，恐怕還是它裏面那些具體事實。像景明的曾祖父、與孫中山同年出生的熊廷權：他是清末民初一位正直有才略、膽色和遠見的地方官，不但進西藏協同平定叛亂，在騰沖和英國人折衝樽俎，更傾力於子女教育，送他們多人出國留學，培養出其後兩代十數位在雲南地方和國共兩黨任職的才俊。這無疑是在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之間，一位偏遠省份的士大夫如何轉型為現代知識分子之最佳寫照。至於他四女熊韻筠也就是景明「四姑奶奶」的傳奇一生，則可以視為中國現代鉅變大漩渦中無數知識分子命運的典型。她考入北京女師大，捲進那場由於魯迅痛罵楊蔭榆而出名的學潮，被迫逃往南京投奔國民黨

中央黨部，由是因禍得福，嫁了後來考到公費留美隨而成為外交官的青年才俊，卻在1937年獨自返回昆明赴國難，積極辦學，參與黨務，抗戰勝利後更當選國大代表。昆明行將解放時她誤判形勢，一再拖延下終於錯過了飛走的時機；此後因為拒絕和新政府合作，不久就被逮捕，坐牢一年釋放，最後鬱鬱以終。

到再下一代，許多人物的命運就各不相同了，這大多是由於性格和際遇造成。像四姑奶奶的大女兒香姑姑之不如意是因為健康和擇偶不佳，小女兒美姑姑之幸福則來自她的過人才華和樂天爽朗。至於景明本家的上一代也是人人命途殊異：大姑姑為愛情私奔；二姑姑其貌不揚，際遇一般，卻堅強地活下來，還能夠周全照顧侄甥輩；三姑姑心高氣傲，風流自賞，潦倒中以阿芙蓉混酒自終；小叔叔酷愛山林，文革中不幸捲入武鬥，結果在林中上吊；么叔叔最有才，參透了「遠害朝看麋鹿遊」之理，自甘流放到甘肅的偏遠山區當獸醫，暮年方得還鄉。這樣數來，老大亦即景明的父親熊蘊石當算是福分不薄。他生母早逝，脾氣倔強，自幼失寵於老父，卻憑意志和毅力成為工程師，抗戰時建築滇緬公路報效國家，解放後管理自來水廠服務人民，雖然愛妻長年臥病，文革受屈，仍然事業家庭兩不失。比起在北大荒受折磨大半輩子才拾得性命歸來的至交黃湛，可謂天淵之別了。景明的母親出身於和樂大家庭，自幼聰慧開朗，中年纏綿病榻近二十載，而不失歡樂達觀和幽默，能夠縮合一家上下和妯娌鄰舍。所以，讀過本書第一部，我們也就可以大致明白，景明的樂天性格包括她對健康近乎癡迷的關注，到底是從哪裏得來的了。

歷史的迷人在於它無窮的紛繁細節，那使人驚愕入迷，但更在於它所載事實之無可抗拒地流逝以至消失，那使人慨嘆也無奈。是的，一切悲歡離合、風雷激盪都抵擋不了時間的推移，而過去的絕對無法重現，只能夠存在記憶之中，此史書與回憶錄之所以可貴。

改革開放之後春回大地，但文革摧毀的一切，已經無法復原；中國開始走向富裕繁榮，因此傳統中國在20世紀初仍然遺留的許多美好面相，也在迅速消失之中。我心目中那個嶙峋荒涼、森然矗立的石林，恐怕只會留存在那幾張小小黑白照片之中了；荒野的怒江已經築起水壩，修起高速公路，我所見過的丙中洛和秋那桶，是否還能夠像瑞士高山上那些小村落般留存下來，也不無疑問。當然，由昆安巷佚園、塘子巷滌園、車家壁默園、撫仙湖等所構成的那個魔幻世界，更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剩下這本小書為它們作見證了。為此，我們應該深深感謝景明。

2021年暮春於用廬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  
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資料

## 小家事，大歷史

1978年9月，考上中國民族史專業的研究生，我從西雙版納的猛海縣回到離開十年整的雲南大學，師從方國瑜教授研修。

學習時，我以《新纂雲南通志》中的〈邊裔考〉向國瑜師請教。

國瑜師說：〈邊裔考〉為熊廷權撰寫，基本上採用光緒《續雲南通志》的資料編成，未能全面記述鄰國的歷史與現狀。國瑜師認為雲南歷史與緬甸、越南、泰國有密切關係，他收集整理有關緬甸、越南、泰國以及柬埔寨、馬來亞、印尼、菲律賓諸國的資料，要重新編寫〈邊裔考〉，取代熊廷權的稿子。雲南通志館第三任館長趙式銘認為熊廷權長期擔任邊地官員，有豐富的邊疆治理經驗，熟悉周邊國家情況，否定了國瑜師的建議，堅持採用熊廷權的稿子。

民國二十年(1931)2月新纂雲南通志籌備處成立，熊廷權擔任顧問。當年9月通志館正式成立，熊廷權被省主席禮聘為編纂。

國瑜師是新纂雲南通志館第三期(1938-1941)的編審，審訂時(1943-1944)被聘為審定委員。國瑜師是麗江人，他告訴我，民國麗江第一任縣長就是熊廷權。他為民效力，恪盡職守，政聲卓著，有碑載道。其才華橫溢，為袁嘉穀、李根源、周鐘岳、趙式銘老輩學者讚譽。

熊廷權是景明的曾祖父。她說曾祖父是大家族的「靈魂人物」。其實，在民國時的雲南學界，熊廷權也是一位引領風騷的卓然大家。

民國初年，唐繼堯主政雲南，他是「聯省自治」的倡導者、推行者。他在雲南推行省縣兩級行政制，於民國十二年（1923）創辦自治講習所，選任具有自治學識經驗者，組織制定自治條例。召集有識之士集中在自治講習所，編寫《雲南全省地方自治所講義》十種。熊廷權的兒子，也就是景明的祖父熊光琦編寫其中第三種：《雲南全省暫行縣制釋義》。雲南大學歷史系2013級的碩士研究生段玉蓉在周立英副教授的指導下，以熊光琦這本書為中心，將熊光琦的生平資料搜羅殆盡，撰寫〈小縣長 大追求——熊光琦縣區自治的理想與邊地國防建設的計劃〉的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實事求是地論述民國時期，雲南省縣自治的歷史過程與熊光琦對雲南縣省自治做出的重大貢獻。評審專家和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一致認為論文對熊光琦的評價實事求是，平允恰當，是研究民國雲南自治的創造性成果。

聯省自治、省縣自治是民國雲南地方當權派的追求。他們希望通過自治，提高民智、健全法制、發展經濟、安定社會，興滇富民。抗日戰爭期間，保持自治的雲南接納了從內地遷來的大學、機關、企業、商戶。保持相對自治的雲南，為從淪陷區來的難民，提供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的環境。昆明獲得「民主堡壘」的美稱，獨裁專制的政府容不得自治的雲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8月底，盧漢率領滇軍進入越南接受日軍投降。不久，滇軍被派到東北打共產黨。10月3日，杜聿明在昆明發動政變，蔣介石下令免去龍雲本兼各職，調任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命盧漢任雲南省政府主席。1945年12月1日發生震驚中外的「一二一」事件。1946年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樸在昆明大興坡被暗殺，7月15日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在昆明西倉坡被暗殺。李公樸、聞一多慘案

激起全國人民憤怒。西方民主國家亦對專制獨裁政權表示極大不滿。1946年5月30日，滇軍184師少將師長潘朔端率部在東北海城起義，開國民黨軍兵團起義的先例，為蔣軍在東北失敗敲響喪鐘。1948年10月，曾澤生將軍率領滇軍60軍在長春起義，為國民黨整軍反正投向光明的典範，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奪取遼瀋戰役的全面勝利鋪平道路。1949年12月9日，盧漢在昆明宣佈起義，成為搗毀蔣家王朝的最後一擊。蔣介石固守西南頑抗的計劃破滅，雲南自治的夢想與蔣家王朝的獨裁同歸於盡。

這段風雷激盪、驚心動魄的歷史既是長輩故事的社會背景，又是長輩故事演變的動因。從長輩故事，我們看到雲南社會的變遷。一個人的經歷，一個家族的興衰，就是社會演變的縮影。閱讀長輩的故事，我們對時代風雲、社會變遷不僅有更加真切、更加感性的認識，而且有更加深刻、更加理智的體悟。

在騰沖長大的我，在進入雲南大學歷史系之前對騰沖的歷史一無所知。無論中國史還是世界史，無論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中學歷史課都是國家統編教材。就是大學歷史系的教材，兩門通史也是教育部統編的，我們的教授、講師大多按照教育部的教學大綱授課。我們知道國內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對雲南地方歷史卻知之甚少，更不要說小小的騰沖城。直到我師從方國瑜研修雲南地方史才開始逐漸了解。讀長輩的故事，使我們對家鄉的歷史有更多的認識，彌補了教科書的不足。

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權1919年擔任騰越道道尹、騰越海關監督。民國初年，雲南實行省縣兩級的行政體制。在實行過程中，省政府對縣的管理力有不逮，於是加設省府的派出機構「道」管理縣。騰越道管轄半個雲南省二十九個縣以及分佈在滇西邊地的五十餘個土司，地廣民多，位高權重。可是熊廷權舉重若輕，勝任愉快。尤其難得的是秉公辦事，清正廉潔。過生日，賀壽的禮品全部退回。

「年方九歲的七小姐，不情願地取下腕上晶瑩剔透的玉手鐲。」讀到這裏，不由得肅然起敬。想到曾任雲南大學校長的吳松到保山市任市長，收取不法商人價值158萬圓的翡翠手鐲。兩相對比，立見高下。那時的官吏嚴於自律，忠於職守，奉公正己，勤政為民，令人景仰。

讀景明《長輩的故事》自然聯想到自己的長輩。景明的外公蘇滌新在晚清官費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我的祖父林春華也是晚清科考舉人，公派到日本留學，與李根源一起創建同盟會雲南分會，並擔任《雲南》雜誌的主筆，想來應該和蘇滌新有交往。歸國後，祖父積極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鬥爭，在辛亥革命中有所貢獻。熊廷權是民國首任麗江縣長，我祖父則是民國首任景東縣縣長。他帶兵剿滅地方豪強蘇三阿，為民除害，當地民眾立碑讚頌。景明的祖父熊光琦也擔任過景東縣縣長，想必對他的前任會有了解。祖父那一代讀書人在社會大變革中，與時俱進，他們的生命史可歌可泣。將他們的故事寫下來，不僅僅只是對他們的紀念，更是對後人的激勵。

景明的父親和乾爹黃湛參加滇緬公路的修築。滇緬公路的修築是雲南各族民眾創造的世界交通史奇蹟，由於大多數青壯年男人都奔赴抗日前線，修路的主要是婦女、兒童和老人。公路在1937年12月動工，經九個月艱苦奮鬥提前竣工通車，當時被稱為「婦幼路」。參加築路的工人約二十萬，工程技術人員約二百人，景明的父親和黃湛就是二百個工程技術人員之一。這條路被稱為「血路」，因為幾乎每一公里至少要付出一條生命的代價。歷史書上用一連串的數字說明這條「血路」修築的艱難和在抗日戰爭的巨大作用。景明的書則用生動有趣的文字講述父親與乾爹等年輕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獨立設計功果橋、惠通橋等全部橋樑的智慧，以及用竹竿一尺一尺丈量道路的艱辛。滇緬公路被稱為抗日戰爭的「生命線」。1942年5月10日軍佔領騰龍地區後，公路中斷。1945年1月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

殲滅滇西緬北日軍，在芒友勝利會師。這是自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民第一次全殲外國侵略軍的偉大勝利，拉開中國抗日戰爭取勝的序幕。滇緬公路重新通車。蔣介石為安慰被他趕走的史迪威將軍，也為討好美國政府，爭得美援，將這條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這就掩蓋了雲南民眾和工程技術人員修築這條道路的的巨大貢獻，也淹沒中國遠征軍為打通滇緬公路做出的犧牲。

雲南是祖國的西南邊疆，但不是遙遠的蠻荒之地。晚清民初，雲南得風氣之先，走在對外開放的前列，「走夷方」帶來了財富，也帶來文明、帶來科技、帶來思想。清朝末年，為富國強兵，雲南派出士子到東瀛、西洋求學。這些海外求學的青年人回到雲南，成為辛亥革命的先鋒。他們在雲南首舉義旗，打響維護共和的第一槍，以西南一隅，震撼全國，驚動天下。中國第一水力發電廠在昆明海口建成，全國第二個飛機場在昆明巫家壩啟用，中國第二個城市自來水廠在翠湖為全城提供清新可口的「機器水」。雲南創辦的航空學校培養中國第一批天之驕子，其中有韓國的「航空祖母」權基玉。東陸大學是中國創建的第一批現代大學。首任校長董澤1907年入省府貢院，第二年考取留日公費生，在東京同文書院深造，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革命勝利後赴美深造，獲碩士學位。在他的努力下，1922年12月8日東陸大學成立。

景明的外公蘇滌新是雲南第一代留日學生。他與同時代的留學生不負眾望，為雲南、為國家做出了無愧時代的貢獻。他的三子，也就是景明的三舅蘇爾敬則是在抗日烽火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雲南省政府出資與西南聯大合辦的留美預備班。正如景明所說，雲南留美預備班是中國教育史上難得一現的曇花。

曇花綻放需要優良的環境，肥沃的土壤。相繼主政雲南的唐繼堯和龍雲都十分重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國十七年(1928)省主席龍雲將雲南省的捲煙特捐全部作為省教育專款，若有不敷，由

財政廳如數撥足。所有教育經費悉數由教育機關管理，實行教育會計獨立。抗日戰爭期間，雲南省教育經費開支僅次於國防經費，位列第二。由於雲南省教育與經費充裕，在整體安排教育事業經費、推進義務教育、發展邊地小學和簡易師範、加強省立中學、建設大學的同時，可以選拔優秀人才赴美國留學。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記錄他與雲南省經濟委員會主任繆雲台、教育廳長龔自知商談留美預備班事宜有十三次之多。如，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梅貽琦校長邀約潘光旦等到繆雲台家，與繆雲台、教育廳長龔自知商談留美預備班事。1942年12月21日星期天，梅貽琦與潘光旦、沈履（清華大學秘書長、西南聯大總務長）、金龍章（耀龍電燈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等再次商談留美預備班事，決定1月4日開班，繆雲台為班主任，沈履、金龍章為副主任。1943年1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三點雲南留美預備班舉行開幕典禮。繆主任報告後，龔（雲）主席有訓詞。

1945年6月，金龍章護送三十九名留學生假道印度加爾各答轉孟買，乘船在海上航行約兩個月，於8月2日到達美國紐約，分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等名校深造。他們中除少數人繼續在美攻讀或實習外，大多數人返回祖國，回到昆明的有九人，到外省的有二十餘人。他們大多為共和國做出重大貢獻，如中國貴金屬的開拓者奠基人譚慶麟，他在1962年組建昆明貴金屬研究所；四川農業大學校長楊鳳；化工自動化教育的開拓者、浙江大學副校長周春輝等。

方國瑜的侄子方寶賢與景明的三舅蘇爾敬未能返回祖國，但他們報國的拳拳之忱始終熾熱。一有機會，就慷慨輸將。方寶賢於1972年回昆明，他主動到雲南大學講學，從此每年帶兩名雲南大學物理系的青年教師到他所在的哈佛大學航天實驗室進修。

方寶賢對雲南高等教育、科技進步十分關心，不過也有些擔

憂。他對我說：回到雲南大學，校長對他講教學改革的成就，一是實行學分制；二是建立學院，實行校院系三級管理。他說：這兩件事早在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大學就實行了。大學要像龍雲時代經費獨立、辦學獨立、教師獨立才有希望。

長輩的故事，有曾祖父、祖父、父母、叔伯、姑姑、姨媽、乾爹、友人等，每一個故事都生動感人。他們的故事是時代的縮影，他們的故事是歷史的記憶。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們對近百年的雲南歷史、對中國的歷史有更加感性、更加深刻、更加理智的認知。

景明說，1958年讀中學時，舉國大煉鋼鐵，他們連夜從昆明城步行四十多公里到安寧，去礦山敲鐵礦。那時我在騰沖一中讀書，在距城二十多公里的緬箐山間挑鐵礦。一天晚飯後緊急集合，所有學生挑着鋪蓋行李和勞動工具，翻山越嶺轉移到滇灘鐵礦。途中在荒山野嶺天降瓢潑大雨，無處躲避，個個淋得渾身濕透，還要堅持「行軍」。走了一夜，天快亮時到達礦山，倒頭睡到中午。吃過午飯就投入緊張、艱苦的勞作。1960年元旦，我們高中生被政府調派去修築騰沖到盈江縣的公路。也是晚飯後挑着行李和勞動工具從騰沖縣城步行四十多公里到梁河縣，走了一夜到梁河縣中學的教室的地上睡到中午，吃過午飯步行到梁河縣與盈江縣交界的一座名叫風口山的大山上，動手砍樹搭建窩棚露宿在荒山野嶺。一個班的學生負責在大山上用鋤頭挖出一公里的公路，苦幹二十多天，直到全線通車，我們才得以回到學校上課。

景明說，饑荒時期她的舅舅請在香港的朋友楊正光買食品寄回來。楊正光是我的表叔，楊正光的表弟謝熔是我的舅舅。舅舅每月從香港給我們寄豬油來，僑居緬甸的姑父寄米麵來，我們一家才沒有因饑荒餓出病來。

景明與我同在1962年9月進入雲南大學讀書。她在外語系，我在歷史系。

1962年國家為應對困難與危機，大學招生比大躍進時期縮減一半多。當年招生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雲南大學八個系，僅招生486人，為1960年招生1,173人的41.43%。那時女生人數很少，不到五分之一。景明在女生中姣好出眾，能歌善舞，引人注目。

景明說，她在文革初期因學習好被批判。我也是被當做「修正主義的黑苗子」被無情鬥爭，還被抓到台上和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低頭彎腰站在一起「陪鬥」。

讀到〈孤雁南飛〉，我立刻想到田伯母的兒子小哥哥，他是我們歷史系1978級的一位傑出同學。他在1977年高考時是文科第一名，英語第一名，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被錄取。第二年又是第一名。他的第一志願是外語系英語專業，可是外語系沒有錄取他。歷史系主任張德光教授愛惜人才，將外語系退出的學生報名檔案收到歷史系來，他入學後在歷史系讀書。當時全校學生都學英語，可是英語教師不夠，他被公共外語部請去教授英語課。小哥哥留學美國，成為當代重要的人類學家。在文革鬧騰最兇的歲月，小哥哥和景明以及兩位男生，在一起安靜地自學。他們朗讀古文、背誦唐詩、吟詠宋詞、閱覽中外經典名著、學習英語、遊走山水，被稱為「春城四賢」。「春城四賢」年齡最大的李先生，1981年被民族大學校長馬曜教授請去擔任研究生的英語教師。我慕名去聽他的英語課，獲益良多。他後來到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另一位賢人到美國行醫，成為國際認可的針灸名家。「春城四賢」是特定時代不隨大流、獨立特行、自我奮鬥的年輕人，是十分感人的勵志故事。

社會到處都有遺忘的角落，遺忘的角落藏着民族的歷史。景明像一位不辭辛勞的考古工作者，踏遍青山，越過荒野，將遺忘角落藏着的歷史發掘出來，讓我們從中獲得有益的借鑒和深刻的啟迪。

景明講的故事，我們也經歷過，自然引起共同的心聲。

景明講的故事，是我們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景明講的是家族的小故事，反映的是民族的大歷史。

景明說，記憶像篩子，很多細節都被漏掉。但是，藏在心底的記憶大多是刻骨銘心的經歷，終生不忘。這些記憶真實、真切、可靠、可信。事實上，我們的歷史書是一張孔洞疏闊的網，大大的網眼漏掉不少人物與事件，漏掉許許多多細節與情景。何況，統治者會利用權力刻意湮沒、歪曲、剷除歷史的記憶。歷史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景明講的故事，格外真實，也就格外珍貴。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說過：「如果喪失對歷史的記憶，我們的心靈就會在黑暗中迷失。」重溫長輩的故事，就是為了不要喪失歷史的記憶，不要讓我們的心靈在黑暗中迷失。

對於一個要發展進步的民族，歷史不容遺忘，歷史的真相不容歪曲，歷史的面貌不容模糊。

記住歷史，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景明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十多年前，景明的《家在雲之南》甫一出版就引起轟動，一到坊間，即刻售罄。因為故事真實感人，激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共鳴。

現在，景明的《長輩的故事》用樸實的語言，清晰的脈絡，平靜的敘述，給我們講述先輩的經歷，讓我們不忘來時的道路。只有不忘來時路，我們才不會倒退；只有不忘來時路，我們才能開拓新路，做出超越前人的業績。

這本書用真心寫成。因此讀來貼心、動心、暖心。

林超民

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雲南大學前副校長

# 作者自序

熊景明

2007年退休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持「民間歷史檔案庫」項目，收集回憶錄、口述史類的圖書，並宣導家史及回憶錄寫作。從何入手？很簡單，閱讀出色的回憶錄。首推台灣作家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四部曲，從內容到文字堪稱範本。2017年終於在紐約見到鼎公，人如其文，幽默而談吐不凡。他遞給我《家在雲之南》，我立即的反應是他很環保，書讀罷可轉給其他人。翻開批滿評語的書頁，我怔住了，像是捧着今生得到的一項大獎。溢美之詞雖不敢擔，卻由衷感激能借着我對父母及親友的回憶，和鼎公、也和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讀者成為知音。

歷盡風霜的中國人，往往有記錄往事的衝動和責任感。歷史感和社會責任外，寫下離我們而去的親友，即便不出版，不流傳於世，也能讓他們存活在家族記憶之中。有機會分享家史寫作心得時，我常說：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寫完父母，接着寫從曾祖父到眾位姨媽、乾爹……好像是「請君入甕」。

本書所寫的長輩，大多極為平凡。記錄他們的言行，回想他們的作為，思索他們的人生，卻讓我看到各人的不尋常之處。收留孤兒的二姑姑，飽讀詩書的「車衣女工」田伯母，處變不驚的大姨媽，

看來均無甚建樹，卻具備難能可貴的品格，而她們自己和周圍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個人遭遇和處境受到所處時代的左右，時局與社會因為制度、經濟、科技等因素，許多時候變得眼花繚亂，乃至不堪，唯有文化恆久而貫穿始終。文化也在變，不過變得慢，甚至慢得不易察覺。近一百五十年前，曾祖父四歲時，每晚睡前母親要他背唐詩，和今天的母親差不多。曾祖父的父親年輕時，賊人入戶盜竊，兩兄弟拼命保護的是母親的壽衣，今日已無法理解。

書中的長輩每人歷經動盪，革命、抗戰、內戰，之後是不平靜的和平年代，譜寫出悲歡離合的曲折人生故事。其中，乾爹黃湛的經歷最為傳奇，也最感人。即便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他依然追求生命的意義，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些長輩用自己的行為彰顯這個民族最可貴的氣質，用自身遭遇的委屈告訴我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近二十年來，回憶錄、口述史寫作蔚然成風。2006年，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民間歷史檔案庫」項目應時而生，林達負責編撰網刊，我協助建立檔案。我們笑稱自己為賣瓜的「王婆」，至今已經收集了六千餘冊回憶錄、家族史、自傳、日記、照片。民間的回憶文字記錄個人經歷，折射時代並為歷史以及歷史事件做註、作證，它不同於作為歷史研究方法的「口述史」，對準某一歷史事件或人物，不同於集合個人回憶呈現完整的一段歷史之「公共史學」。例如，台灣中研院的口述史項目對許多歷史人物進行訪談，包括齊邦媛父親的《齊世英口述自傳》，我看完後才知道這本「自傳」完全擯除和政治無關的人和事，書中連他的女兒齊邦媛也不見影蹤。

民間回憶錄雖沒有講述完整的歷史，卻能夠生動地再現歷史場景。看過許多與科舉制度有關的文字，待我寫曾祖父考舉人、進士的經歷，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我上學時受到的教化，民國的官員

叫舊官僚，騎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探究幾位長輩的經歷才發現，跋涉千里到荒無人跡的瘴癘之地工作，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閱讀曾祖父、祖父和外公留下的大量文字，是學習近代史的過程。外公對政權交接時普通百姓感受的記載，還有他當時寫給市政府的信件，都是史料。民間歷史和作為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口述歷史」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中心的「民間歷史檔案庫」按人物的出生年份排列，冀圖呈現一段歷史。例如，要知道1950年代初的小學教育，可以參考1937至1947年出生的三百零三位作者所寫的回憶。這些書在書架上按年份排列在一起。

有那樣的父母，生在那樣的大家庭，我才能寫出這些故事。我母親常說，父母養其身，自己長其志。按現在的科學發現，個人的稟賦、甚至性格，都與血脈傳承相關。我還「迷信」歷來受到父母和長輩的在天之靈照看，故而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揮所長，參與建立當代中國研究最完善的館藏；在這個中外學者交流的平台如魚得水，結識了那麼多優秀的人，收穫了那麼多友誼。

我的家人住在昆明、上海，我卻能感受他們的關照。晚間躺下，想起外孫女，帶着微笑入睡。除了身邊的朋友，網路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香港回歸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辱使命，成為華人出版界的佼佼者，書在這裏出版，幸甚。感謝陳方正、林超民這兩位重量級的學者為本書寫序。

寫長輩的故事，時光倒流，令我變回膽小又好奇的傻丫頭，成了跟着母親唱歌、看外婆梳頭裹腳、看二舅擦他的尖頭皮鞋、跟八姨去值夜更的小女孩。我在大家的愛撫下長大，無以為報，唯有記下，唯有思念。